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

主办

流寓文化研究

第二辑

主编 张学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

主办

流寓文化研究

第二辑

主编 张学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寓文化研究. 第二辑/张学松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161-8356-4

I. ①流… II. ①张… III. ①地方文化—雷州市—文集
IV. ①K296.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329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熊 瑞
责任校对 董晓月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203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流寓文化研究》编委会

主 编 张学松

副主编 邓 建 蔡 平 刘 刚

委 员 黄小玲 黄 战 李雄飞 刘 岚

刘世杰 彭洁莹 沈晓梅 孙长军

杨励轩 赵国政 赵永建 钟嘉芳

朱欣文

目 录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中国古代流寓作家的生存困境与自我调适	张学松(1)
流寓和迁徙:文学家的动态分布	曾大兴(11)
流寓:中国古代民歌文化形态研究	李雄飞(35)
南朝流寓岭南诗人考略	蔡 平(44)
张九龄谪迁的文化意义	陈建森(67)
从困在人间到哲理解脱	

——漫谈刘禹锡迁谪诗的自我超越	杨子怡(84)
宋代雷州流寓士大夫与天宁寺的深厚因缘	李明山(99)
苏轼倅杭与西湖词人群体叙事	张海鸥(108)
苏辙流寓雷州的情感历程	彭洁莹(125)
胡铨流寓雷州行迹考论	钟嘉芳(140)
湛若水的流寓人生与书院情结	邓 建(153)
任伯雨生平行迹史料补正	刘 刚(163)
汤显祖《粤行五篇》考	刘世杰(177)
广州府部县志载寓贤情况	陶原珂(191)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中国古代流寓作家的生存困境与自我调适

张学松*

内容提要 流寓作家的生存困境包括流徙途中和在流寓地两个方面,其中,在流寓地的生存困境主要表现为自然环境的恶劣、物质生活的匮乏、方言俚语的隔阂、政敌的迫害与世态炎凉。置身生存困境,流寓作家自我调适的主要途径有四:诗酒自娱,登山临水,交游著述,深入民间。

关键词 流寓作家 生存困境 自我调适

无论战乱流徙还是出使被扣押或遭受贬谪,中国古代流寓作家的生存状态都是艰难的。身处生存困境,作家往往进行自我调适以求精神解脱。本文对此试作论述。

一 中国古代流寓作家的生存困境

流寓作家的生存困境包括流徙途中和在流寓地两个方面。

(一) 流徙途程中的生存困境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奔蜀。杜甫带着家小由奉先往白水,又由白水再向陕北流亡,“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泞相攀牵。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有时经契阔,

* 作者简介:张学松,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主任。

竟日数里间。野果充糗粮，卑枝成屋椽”（《彭衙行》）。真是风餐露宿，饥寒交迫！乾元二年（759）七月，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辗转秦州、同谷，于年底至成都，“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途中艰险而凄惨之状，诗中历历备述。初往秦州，“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一），山长地阔，令诗人度陇而“怯”，及关而“愁”。到了秦州，囊空如洗：“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空囊》）。在秦州无食无衣又往同谷，“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岂但岁月暮，重来未有期。晨发赤谷亭，险艰方自兹。乱石无改辙，我车已载脂。山深苦多风，落日童稚饥。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赤谷》）仇兆鳌注评此诗“伤穷途生死，语尤悲惨”，引梅鼎祚评语：“首四语，凄婉具作。其历叙穷途处，过于恸哭。结语虽直，亦是实情。”诗人到了同谷又怎样呢？“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一），“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五）。诗人又离开同谷前往成都：“忼忼去绝境，杳杳更远适。”（《发同谷县》）

宋德祐二年（1276）三月十八日，元军兵临临安城，文天祥奉命出使元营谈判。二月五日南宋政府投降元朝。二月九日，文天祥被押解北上，行至京口，得间逃脱：“奔真州。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阍，约以连兵大举。中兴机会，庶几在此。留二日，维扬帅下逐客之令。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指南录后序》）其履险蹈绝、九死一生的经历，《指南录后序》连用二十个“死”字作了概括。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仲春经洞庭湖，作《盘陀岭驿楼》：“嵩少心期杳莫攀，好山聊复一开颜。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层楼望故关。”未至岭南，对其蛮荒已心有所惧。《谪迁岭南道中作》：“岭水争分路转迷，桃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行至大庾岭，由于“岭水争分”、“桃榔椰叶”蔽暗溪流，诗人迷途

而不知所之。不仅如此，这遥远而未开化的荒野，充满瘴气和含有剧毒的“蛇草”、“沙虫”，使诗人无比敬畏。

东坡于绍圣元年（1094）被罢定州知州责知英州，行至滑州，上状乞往汴泗之间舟行。状曰：“臣轼言。近准诰命，落两职，追一官，谪守岭南小郡。臣寻火急治装，星夜上道，今已行次滑州。而自闻命以来，忧悸成疾，两目昏障，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缓弱。六十之年，头童齿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长。而所负罪名至实重，上辜恩义，下愧平生，悸伤血气，忧隔饮食，所以疾病有加无疗。加以素来不善治生，禄赐所得，随手耗尽，道路之费，囊橐已空。臣本作陆行，日夜奔驰，速于赴任，而疾病若此，资用不继。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雇人买马之资，无所从出。道尽途穷，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恃此为命，而木将沉，臣之衰危亦云极矣。窃伏思念得罪以来，三改谪命，圣恩保全，终付一郡。岂期圣主至仁至明，尚念八年经筵之旧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强衰病之余生，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炎荒四千余里，则僵仆中途，死于逆旅之下，理不在疑。虽罪累之重，不足多惜，而死非其道，则非仁圣不杀全育之意也。”以衰病之躯，资用乏绝，犯三伏毒暑，陆走炎荒，真可谓“道尽途穷”。还好，乞舟行获准。然，八月舟行渡彭蠡湖至吴城山时，却发生了夺舟事件。《石门文字禅》卷三七《跋顺济王记》：“东坡昔自定武谪英州，夜宿分风浦，三鼓矣。发运司知有后命，遣五百人来夺舟。东坡曰：‘乞夜橹及星江就聚落买舟可乎？’使者许诺。即默祷顺济王曰：‘轼往来江湖之上三十年，王于轼为故人，故人之失所，当哀怜之。达旦至星江出陆至豫章，则吾事济矣。不然，复见使至，则当露寝溲洟。’言未卒，风掠耳，篙师升帆，帆饱，炊未及熟，已渡杨澜，泊豫章，日亭午。”这则记载有点像小说家言。东坡舟行遇阻乞祷龙王（即“顺济王”，庙在吴城山上，见《舆地纪胜》卷二五、卷二六）而顺利到达豫章，是龙王庇佑的结果，未必可信。故事意在说明，一则东坡仁人大德，困危时总有神灵庇佑，二则歌颂龙王显灵。若“发运司知有后命，遣五百人来夺舟”是事实的话，可见政敌对迁谪途中苏轼的迫害之甚！

（二）在流寓地的生存困境

流寓作家在流寓地的生存困境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环境恶劣。

屈原晚年流寓江南，那时的江南并非现今风景秀丽的鱼米之乡，而是僻远荒凉之地，《涉江》描写道：“入溁浦余彷徨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山高蔽日，深林幽晦，雨雪纷纷，乃“猿狖之所居”，根本就不是人住的地方。即使到了唐代，其荒僻而恶劣的环境也并无多大改变。柳宗元贬永州司马，其《与李翰林书》言：“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观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痍”。

雷州半岛瘴雾弥漫、野兽出没，唐宋以来，多少贬谪文人流寓此地，饱受其苦。即使到了明代，这种环境仍无多少改观。万历十九年（1591），汤显祖上《论辅臣科臣疏》批评朝政，被贬雷州半岛之徐闻。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描述此地：“白日不朗，红雾四障，猩猩狒狒，短狐暴鳄，啼烟啸雨，跳波弄涨。”

第二，物质生活匮乏。

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苏武奉命以中郎将身份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流寓匈奴19年。他在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牧羊，渴饮霜雪，饥吞毡毛，掘鼠食草，“节旄尽落”。

杜甫流寓西南，依靠友人盖了座草堂，但秋风秋雨一来，茅屋为秋风所破：“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虽有茅屋却难安居。再从“布衾多年冷似铁”及《狂夫》“恒饥稚子色凄凉”、《百忧集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等诗句来看，其物质生活的匮乏已到极点，这位流寓大诗人的生活情景类似于流浪汉。大历五年（770），他漂泊湖湘时竟有五天没饭吃，幸亏耒阳县令派人送来酒肉，算是没有饿死。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一《李卫公帖》：“李卫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饷以衣物，公有书答谢之，曰：‘天地穷人，物情所弃……大海之中，无人拯恤，资储荡尽，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绝食，块独穷悴，终日苦饥，唯恨垂没之年，须作馁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药物尽裹，又无医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李德裕在海南的这种遭遇，到宋时苏东坡

贬海南同样遇到，他在《与程秀才》的信中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秦观贬雷州，生计艰难，过着“灌园以糊口，身自杂苍头”（《海康书事》）的囚徒般的生活。

元大德元年（1297），词人张炎流寓宁海，为衣食之计曾设卜肆摆卦摊。戴表元曾感慨地说：“士固复有家世才华如叔夏，而穷甚于此者乎？”（《剡源集》卷三《送张叔夏西游序》）

第三，方言俚语造成隔阂。

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工具。一地有一地的方言，比如雷州半岛的黎语、粤语，外来人就很难听懂，切莫说古代，即使今天，国家推广普通话已有几十年，而在民间方言依然盛行。唐宋以降多位中原作家流寓至此，他们首先感到的是语言交流的障碍。寇准流贬雷州，教授中土正音，正是力图消除这种障碍。《遂溪县志·民俗志》：“查遂境话语皆习乡谈，惟读书则与中州正音相近，听之呖呖可晰，与说话迥殊。询阙所由，金称昔寇莱公寓此，亲为口授，后来教育者循习递传，至今不改。”这则记载意在称颂寇准寓雷州传授中土正音的功绩与德泽，但细心阅读可知，寇准传授中土正音也只是影响了士人的读书，而其“乡谈”依旧用本土方言，所谓“读书”“与说话迥殊”是也。

一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古之流寓者往往是离开本土而到荒远的异域他乡，其风俗之殊岂止“十里”之改也！“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悲愤诗》）蔡琰的这两句诗固然表现了其民族观的局限，但华夏汉族与北方匈奴风俗的悬隔则是客观事实。比如，匈奴首领单于死后，其妻须下嫁继位的儿子，这种风俗，即使放到今天也难以接受。蔡琰流寓南匈奴12年，作为诗礼之家一代名儒蔡邕的“爱女”，称其“人俗少义理”也就可以理解了。秦观《雷阳书事》其一：“骆越风俗殊，有疾皆勿药。束带趋祀房，用史巫纷若。弦歌荐蜚栗，奴至洽觞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鸡骨灼。”雷州半岛巫风盛行，人们患病不请医生医治，而请巫覡祈祷除病，对这种陋俗，秦观看似平静地描述，其实是深感不解与不满，“风俗殊”即是与中原风俗相异令人不解，对这种陋俗以致病人“呻吟殊未央”，作者更是不满。

第四，是政敌的迫害与世态炎凉。

因贬谪而流寓的作家，到流寓地后依然遭受政敌迫害。

宋乾兴元年（1022）二月，寇准由道州司马再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在雷州，政敌既不允许他住官舍也不允许住民舍，他只能寓居天宁寺。崇宁二年（1103），黄庭坚被贬宜州（今广西宜山县）。初至宜州贬所，庭坚在城中租屋居住，后宜州太守说庭坚是罪人不能住城里，于是搬到城南租了一间四壁透风屋顶漏雨的民房居住。苏轼、苏辙兄弟在雷州受到雷守张逢、海康县令陈谔及太庙斋郎吴国鉴等礼遇。政敌章惇就奏请皇帝差使察访。据《苏颖滨年表》，元符元年（1099）二月“诏差河北路转运副使吕升卿、提举荆湖南路常平董必并充广南西、东路察访”。谋起大狱，悉诛元祐臣僚。后因曾布上奏“升卿兄弟与轼、辙乃切骨仇讎，天下所知，轼、辙闻其来，岂得不震怒，万一望风引决，朝廷本无杀之之意，使之至此，岂不有伤仁政”？而未派吕升卿，但仍派董必察访。《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四元符元年三月癸酉纪事：三省提举荆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奏：体量到知雷州、朝请郎张逢又令僦进纳太庙斋郎吴国鉴宅，逢每月率一两次移厨管待，差白直七人，借事本州海康县令陈谔，差杂直追呼工匠等应副吴国鉴修宅，又勒居民折退篱脚，阔开小巷，通行人马，以避辙门巷及借手力等事。由此，张逢被勒令停职，陈谔受到处罚，吴国鉴被鞫问。苏辙被诬告强夺雷氏田宅，移循州安置。苏轼到海南，《与程全父》简：“初至，僦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

一个人在政治上倒霉之后，隔岸观火者有之，推倒油瓶不扶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即使有人内心同情，但怕受牵累也曲意回避，甚而亲朋故旧，乃至自己的门生或接受自己提拔的人也是这样。古代社会，皇帝是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的，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是也；而同僚则相反，是可同安乐难于共患难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者少矣。趋利避害乃人类普遍心理。李德裕《与姚谏议郃书》与《崖州志》皆载：德裕贬崖州，“平生旧知，无复吊问”。苏辙《巢谷传》：“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问者。”又其诗《闰九月重九与父老小饮四绝》曰：“获罪清时世共憎。”由“居庙堂之高”而移“处江湖之远”，其心理落差本来就大，遭此炎凉世态，其内心的孤独可想

而知。所以,余以为流寓者最大的生存困境倒还不在自然环境的恶劣、物质的匮乏、方言俚语的隔阂,乃至政敌的迫害,而在心灵的孤独。苏轼中年流贬黄州时所作的诗词中,“缥缈孤鸿影”的孤鸿和“名花苦幽独”的幽独的海棠是这种困境的最典型的体现。不仅因贬谪而流寓者内心孤独,由其他原因而流寓者内心也是孤独的。杜甫漂泊西南时“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不正是其孑然无依之孤独感的流露吗?“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细细品味,“天地一沙鸥”的“沙鸥”是何其孤独:茫茫天宇,辽阔大地,空旷无垠中,只有一只沙鸥在飘飞!杜甫与苏轼时空远隔,而“沙鸥”与“孤鸿”则心有灵犀,同调异曲。其实,早于苏、杜的中国第一位著名流寓诗人屈原在《离骚》中所描述的“国无人莫我知”,上叩天阍而不开,下求佚女而不得的“我”的形象也是孤独的典型。孤独感似乎是流寓作家共同的精神困境。庾信等人流寓北方受到统治者重用,“位望通显”,物质生活优渥,其《哀江南赋》何以写得如此悲婉凄凉?“南朝词人北朝客”,寄人篱下,内心孤独啊!王粲离开战乱之地而流寓荆州,荆州的相对安宁和山水之美,并未使他的心灵得到安顿,依然感到漂泊和孤独,因为“虽信美而非吾土”!

二 生存困境中流寓作家的自我调适

置身如此生存困境,作家如何自我调适?其途有四。

第一,诗酒自娱。

诗可发愤以抒情。读诗作诗皆然。当然,这里的诗又可泛指诗书。

苏轼100多首“和陶诗”分别写于知扬州(20首)、流寓惠州(48首)和儋州(56首)之时,这并非偶然的現象。苏轼流寓黄州时觅得《陶渊明诗集》,其《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曰:“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读渊明诗乃是为了“自遣”,书写陶诗也为“自遣”,《苏轼年谱》卷三三:谪惠途中,“经彭泽,或于舟中书陶潜《归去来辞》,舒胸中结滞”。而创作“和陶诗”原因固是多方面的,但通过与古代知音对话以寻求精神解脱无疑是一重要因素。张强《从“和陶诗”看苏轼的心态变化与审美追

求》一文认为：“长期的贬谪生涯使苏轼从陶诗面向田园的纯朴自然的风格中发现了寄托情思的别样世界，为其写下‘和陶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和陶诗’中，苏轼以陶渊明式的眼光向内自省，寻找精神的皈依；向外体察山川万物，以静观的姿态领悟人生，在达观中寻求安宁，在反省中关心现实。”正道出了苏轼创作“和陶诗”的动机。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未免有点消极，但以酒消愁，寄酒为迹，是中国古代文人遭遇困厄时的一种解脱方式，虽然“举杯浇愁愁更愁”，但心灵可以得到暂时慰藉。秦观寓居横州浮槎馆，醉酒醒后，作《醉乡春》词：“唤起一声人悄。衾冷梦寒窗晓。瘴雨过，海棠开，春色又添多少。社瓮酿成微笑，半缺酴醾共舀。觉倾倒，急投床，醉乡广大人间小。”天晓后作者被唤起，顿感衾冷梦寒。而“瘴雨过，海棠开，春色又添多少”正是酒醒后所领略的美妙景色。回想起昨晚“社瓮酿成”，“半缺酴醾共舀”，大醉投床，作者一声长叹：“醉乡广大人间小！”“醉乡广大”者，词人暂时忘却“人间”的烦恼与苦闷也！在雷州，秦观也常常借酒宽心，《饮酒诗四首》其二：“左手持蟹螯，举觞瞩云汉。天生此神物，为我洗忧患。山川同恍惚，鱼鸟共萧散。客至壶自倾，欲去不容间。”作者仰瞩云汉，引觞自酌，与山川鱼鸟相知同醉，抑郁苦闷的情怀得到暂时缓解与消释，“天生此神物，为我洗忧患”！

第二，登山临水。

山水怡情。《论语·先进》记载孔子赞赏曾皙“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趣，古今学者聚讼纷纭，皆索解其微言大义，其实这段话并无特别玄奥，它所表现的就是孔子向往春暖时分去郊游寻求人生乐趣。这当然是与孔子身处礼崩乐坏之乱世，政治主张推行不了思想郁闷分不开。思想郁闷了，到野外去玩玩该有多好啊！王粲流寓荆州寄人篱下心情郁闷，《登楼赋》一开篇就说：“登兹楼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销忧。”“销忧”就是“登楼四望”的目的，也是这篇赋作的总纲。柳宗元贬谪永州，遍游永州山水，写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销忧，舒解郁闷情怀。《始得西山宴游记》：“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恒惴惴”即作者流寓此州的精神困境。“是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

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这是宴游的过程，有实写有虚写，“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就可能是虚写，游山玩水，“醉卧而梦”者现实中很少有。“醉卧而梦”是作者为解脱“恒惴惴”的困境而虚设的场景。梦醒而归，“以为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这是作者宴游后的精神境界：只有大自然的奇山异水“皆我有”，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这与后世苏轼《前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乃同一境界。此时作者“恒惴惴”的精神困境已得到舒解，但尚未彻底解脱，“是州奇山异水皆我有”的境界还不是最高境界。当“九月二十八日”作者游了过去未曾游过的西山之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觴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其精神困境才得到彻底解脱。“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即庄子“虚一而静”、“物我两忘”的超然世外的精神境界。进入这种境界算是彻底解脱了“恒惴惴”的精神困境——当然，这只能是暂时的。柳宗元这篇山水游记非常形象而典型地展现了流寓作家以登山临水自我调适解脱精神困境的过程。后世流寓作家之山水游记多受此影响，如苏轼流寓黄州的前后《赤壁赋》。

第三，交游著述。

流寓者在处于人生低谷时，无论世态多么炎凉，无论遭到了多少世俗的白眼，但总有不少古道热肠者，如上述张逢等；人世间白眼狼有之，而风骨凛然节操高尚者也不乏其人，如“苏门四学士”等。流寓作家无论在流徙途中还是在流寓地，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总有僧道、士人“与之游”。苏轼就是显例。尽管他“困危多畏”怕牵累别人，而总有人饯送、馈赠、拜访，与之诗酒唱和，充分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例不胜数。其弟苏辙再贬循州，初到龙川便有道士廖有象前往慰问，这位犹如“堕鸡群”的“野鹤”“飞鸣闻巷中，稍与季子亲”（《龙川道士》），给“不见平生人”、人地两生的诗人一家以莫大的慰藉。

著书立说不仅是调适生存困境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是为流寓地文化建设和中华文化所作的重要贡献。秦观编管郴州期间，潜心研究书法理论，著成《法帖通解》一书，对《汉章帝书》等六篇古帖进行了严密周详的考证和深入细致的理论诠释，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颇有价值的书论著作。明杨升庵流寓云南 36 年，在艰苦的条件下撰写或编纂著作近 300 种，为云南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第四，深入民间。

这是流寓作家消解生存困境的最根本的方式。躬耕田亩只能体验到农民生活的艰辛，并不能与人民血脉相连。只有真正地深入到民间，与老百姓交心交友打成一片，才能把身心之根深深地植入大地，并从中获取源源不断的滋养。苏轼流寓黄州期间并未达此境界，晚年流寓惠州特别是流寓海南以后，才真正达到这种境界。在海南，他少了与士子的交游而更多地是与当地老百姓的交往，他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中子云、威、徽、先觉即东坡的四位黎姓朋友。在海南，他与当地儿童也相处甚洽，本诗其二——“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就是明证。东坡在海南真正成为一名普通百姓。正因如此，当他遇赦北归时把海南当作故乡而把故乡当作了寄生之地：“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北返至常州，生命即将结束之时，他写了一首有类绝笔的诗《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此诗展现苏东坡的人生境界得到了极大的升华与超越，他不仅“物我两忘”，而且希望自己像一轮明月一样辉映天宇普照大地，给宇宙万物以至爱和关怀。这是他一生修炼的结果，也与其在海南深入民间扎根大地关系至密。杜甫安史之乱中经历了与难民一样的流离失所，其思想感情与人民已息息相通，故漂泊西南时，生存如此困厄，他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仍然关心国事，体恤民瘼，登岳阳楼，他眺望“戎马关山北”，茅屋为秋风所破，他幻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吴郎禁阻孤贫西邻之女扑枣，他写诗劝说：“堂前扑枣任西邻”，无不表现了一个流寓作家的博大襟怀。

流寓和迁徙：文学家的动态分布

曾大兴*

内容提要 流寓和迁徙，属于文学家的动态分布。动态分布是与静态分布相对而言的。中国古代文学家的流寓和迁徙主要有八种形式，其流入地的地理空间也主要有八种类型。文学家的流寓迁徙一般是有规律可循的：一是从自然气候寒冷的地方迁往相对温暖的地方，二是从人文气候稀薄的地方迁往相对浓郁的地方。而那些被贬谪流放的文学家的迁徙规律，则恰恰相反。文学家的迁徙流寓对其创作来讲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总体来讲，流寓迁徙之地的影响还是不及其出生成长之地的影响那么长久和深刻。

关键词 文学家 流寓 迁徙 形式 规律 意义

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静态分布，一种是动态分布。静态分布是指其出生成长之地的分布，动态分布是指其流寓、迁徙之地的分布。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是相对而言的。一个文学家只有一个出生地，而出生地与成长地在多数情况下又是重合的，不重合者只是少数。文学家的流寓和迁徙之地则不一样。一个文学家往往有多个流寓和迁徙之地。也就是说，文学家的出生成长之地要相对少一些，集中一些，单纯一些，文学家的流寓、迁徙之地则相对多一些，分散一些，复杂一些。文学家在出

* 作者简介：曾大兴，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

生成长之地的生活要相对平静一些，一旦流寓、迁徙，即表明原来相对平静的生活已被打破，人生更富有动感。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称前者为静态分布，后者为动态分布。

流寓和迁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流寓和迁徙都是指人口的转移，但流寓是短期的转移，不一定迁移户口。迁徙不一样，它是一种长期的转移，要把户口由原籍迁移到客居之地，也就是说，要在客居之地落籍。中国古代有许多文学家在异地为官，这叫流寓。即便是贬谪，也还是叫流寓。因为过一段时间，他们就有可能被召回，或者量移（也就是从一个离朝廷比较远的地方，转移到一个离朝廷比较近的地方）。只有极少数文学家一直不能被召回，最后死在贬所。而他们的家人，也就因此而落籍于当地，这就叫迁徙。还有一些文学家，不是因为在外地做官、入幕、授业，也不是因为贬谪，或者隐居，而是纯粹的移民。他们要在移入之地取得户籍，才能被当地所真正接纳，才有自己的土地可供耕种，才能让子弟入读当地的官学，并占用当地的名额参加科举考试。这种性质，也叫迁徙。

我们可以对少数文学家的流寓、迁徙之地进行微观的考察和描述，但是很难对多数文学家的流寓、迁徙之地进行这种考察和描述，因为这个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不是少数几个人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也就是说，关于文学家个体的动态分布是可以进行考察和描述的，关于文学家群体的动态分布的考察和描述则需要假以时日。就目前的条件来讲，我们只能对文学家群体流寓、迁徙的几种主要形式和几个主要地理空间进行宏观的考察和描述。这种考察和描述对于了解文学家的动态分布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对流寓迁徙之地的文化环境的影响，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 文学家流寓迁徙的八种主要形式

文学家的流寓和迁徙，就其形式来讲，主要有以下八种：一是游学，二是应试，三是游宦，四是入幕，五是授业，六是流贬，七是隐居，八是移民。

1. 游学

游学之风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如孔子曾游学齐、宋、卫、陈、蔡等